

【新知選刊●第1027號】

到底是什麼力量促使了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學呈現出與傳統文學迥然不同的面貌？
它的根源是什麼？對它的基本評價又該是如何？

二十世紀

中國文學發生論

本書從二十世紀的經濟狀況與文化背景切入，探討古典文學向新文學轉化的根源與契機。
構想新穎，獨闢蹊徑，能道人之所未道，發人之所未發，令人耳目一新。

樂梅健

著



【新知叢刊一〇二七】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發生論

樂梅健◎著

新知叢列 1027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發生論

著 者：樂梅健

發行人：陳春雄

編輯：鄭閒、張碧珠、朱淑芬、焦慧蘭

出版者：業強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中華路2段163巷6號2樓

電話：(02)3043152、3025140

傳 真：3043153

郵 撥：0743812-9

聯合發行中心

地址：台北市溫州街70號地下室

電話：(02)3627550、3627954

傳 真：3622281

台中分公司

地址：台中市大連北街115號

電話：(04)2955787 FAX：2932499

印刷者：永美印刷公司

法律顧問：蕭雄淋律師

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3220號

1992年4月初版

定 價：新臺幣160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破損或缺頁，請寄回更換)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發生論

仲聯署



獨闢蹊徑 卓然成篇

賈植芳

——序《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發生論》

在我國幾千年的文學發展長河中，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學確實是一個不同尋常的獨特歷史階段。它不僅在語言上以白話代替了文言，以小說、戲劇、詩歌和散文平等並存的局面打破了傳統文學中以詩文爲正宗的一貫格局，而且，在文學觀念上也實現了一次徹底的解放。因而，被稱作「新文學」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與「古代文學」並不僅僅是一個時間上的差異問題，而是有著不同的質的規定性。到底是什麼力量促使了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學呈現出與傳統文學迥然不同的面貌？它的根源是什麼？對它的基本評價又該是如何？這確實是文學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課題。所以，當欒梅健先生的這本《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發生論》一書，專門著力於探討古典文學向新文學轉化的根源與契機時，便具有了文學史研究工作者可貴的史識與新穎構想。

由於本世紀紛紜變幻的政治鬥爭形勢與意識形態領域內的明顯差異，對於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研究往往會帶有超時性、政治化的傾向，稍一疏忽，便會有圖解政治之嫌。真正沈浸於這一階段的文學史料中去進行深入的分析與探討，保持一個純正、冷靜的學術研究頭腦，才有可能得出一些客

觀公正、實事求是的結論。這也是文學研究成果長久地服務於人民、服務於社會的必然要求。值得高興的是，樂梅健先生並不對政治有急功近利的要求，而是一位甘守蝸居、願意坐在冷板凳上認真進行學術研究的學者。在本書中，他把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發生轉變的動力與契機放在「經濟篇」、「文化篇」和「人才篇」這三部分中加以思考，便是他致力於純正學術研究的有力證明。當然，這並不是說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學可以與政治毫無瓜葛，可以彼此之間毫無聯繫，但是，只要對歷史知識稍有了解的人都會知道，任何政治的運動與形式都是當時特定經濟狀況與社會情形的反映，都是不可能憑空產生的。因而，當樂梅健先生從二十世紀的經濟狀況與文化背景切入，去思考本世紀的文學是如何產生與為何產生的問題時，便具有了更為廣闊的思考空間與更為可靠的材料基礎。在本書中，樂梅健先生對近代傳播媒介的變革與文學興盛原因的探討，關於稿費制度的確立與職業作家的出現對文學觀念轉變的論述，指出科學制度的廢除與讀者羣體的轉變對本世紀文學的影響等等，都能道人之所未道，發人之所未發。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成果的取得，正是得益於他純正的學術研究心境與廣闊的學術研究視野。

歷史的腳步即將要跨入到二十一世紀。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隨著一些高科技成果對現有文學樣式的衝擊，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文學又將會在內容與樣式方面發生巨大的變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相對於以往的幾千年傳統文學是一個極其獨特的文學階段，而與今後的二十一世紀文學也會有極大的差異。因而，從發生論的角度對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研究，就不僅可以使人們了解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形成的由來，而且對於人們探討二十一世紀文學的走向及其特點，自然也就有著相當

重要的啓示意義。願這方面的研究引起人們的重視，並取得更爲深入的成果！
是爲序。

（賈植芳，現為中國比較文學學會名譽會長，上海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

目錄

序／賈植芳

緣起

上編——經濟篇

- 一、傳播媒介的變革與文學興盛的契機
- 二、稿費制度的確立與職業作家的出現
- 三、社會形態的嬗變與文學主題的流向
- 四、文體革命的要求與藝術形式的創新

9 27 46 66

中編——文化篇

- 一、五四時期現代文化心理的覺醒
- 二、對現代文明的反撥與民粹主義思潮
- 三、大後方文學：五四精神的全面萎縮
- 四、延安文學：農民文化的時代選擇

85 106 123 143

下編——人才篇

一、科舉制度的廢除與讀者羣體的轉變

二、現代與古代不同的作家隊伍狀況

三、五四和新時期兩代作家的知識構成

餘緒

本書主要參考書目

後記

243 239 235 215 183 163

緣起

當歷史的腳步即將跨入二十一世紀的時候，「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這一概念已經空前響亮地回盪在國內學人的腦中。先有黃子平、陳平原、錢理羣三人的《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①、揭槩於前，繼有陳思和的《中國新文學整體觀》②、李澤厚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一瞥》③、李劫的《中國新文學主潮緒論》④……相繼於後。「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或者稱之為「中國新文學」，正以與往昔全然不同的面目大踏步地走進文學史的研究領域。

不過，上述論著大都還僅僅只是對於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作出的輪廓性勾勒與史論性闡釋——一種基於對這一時期獨特文學現象的初步感悟與匆促印象，而且，各自價值取向上的不同也導致了研究上的歧異。到底是什麼力量造成了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複雜曲折、變動不息的龐大體系？到底有哪些因素支撐了這一階段文學的生存與發展？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與我國數千年的傳統文學為何會形成迥然不同的面貌？外國文學為何會以如此獨特的形態影響與作用於這一階段的文學？各種文學主張與文學潮流之間又為何會如此紛然雜陳、此消彼長？如此等等的問題，在上述學者發出頗富啓示意義的、預言式的召喚之後，也給學術界留下了亟需進一步研究與探討的空間。只有進一步以翔實、

可靠的史料還文學史的本來面貌，以科學的嚴謹態度消除在匆促感悟之中所產生的思想迷霧，才能真正突現與確定這一階段文學的本質特徵與藝術品味，使「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真正卓然獨立於文學發展的歷史長河之中！

關鍵要選取一個有利的觀察視角：一種既能最爲貼切地指出這一階段文學的基本特徵，又能提供人們作出全景式鳥瞰的思維線索與研究方法。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確是自《詩經》以來我國數千年漫長的文學歷史中極其特殊的一個文學階段。近代新聞、出版業的興盛，使文學傳播手段大大提高；一九〇五年傳統科舉制度的廢除，「新教育」在改變著人才培养方式的同時，也大大地擴展了作者隊伍與讀者羣體；稿費制度的確立，使作家的精神產品可以直接轉化爲生活資料，中國文學史上第一次擁有了真正意義上的職業作家……這都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根本區別於傳統文學的地方。如何來觀照這些特殊的文學現象？並如何使自我的研究能夠建立起與這一時期文學嶄新的有機聯繫？一切偏重於文學本體研究的批評方法與體系，諸如精神分析方法、原型（神話）批評方法、形式主義、語義符號學、結構主義、詮釋學等等，都可能偏執於一端而不能全面地作出評價。因爲它需要回答的是一個「它是爲何產生並如何生成」的問題，而不是對某一部作品或某一個文學流派進行的具體研究。這自然就需要一個涵蓋面極廣、並能真正體現與這一時期文學存在對應關係的分析視點與研究手段。

在這裡，率先在西方興起的文藝社會學極具啓迪意義。法國當代評論家埃斯卡皮認爲：「一方面是文學的專業化，另一方面是文學的廣爲傳播，兩者在一八〇〇年前後達到了臨界點。正是在這

時，文學開始意識到了自己的社會尺度。」⑤埃斯卡皮是在評價著名文藝社會學家斯達爾夫人時說這番話的。在一八〇〇年，斯達爾夫人出版了《從文學與社會制度的關係論文學》一書，首次嘗試把文學與社會這兩個概念結合起來作系統的研究，被譽為文學批評史上第一部專門論述文學與社會之間關係的巨著。在十八世紀的歐洲，知識的專門化促使科學和技術活動逐漸脫離了嚴格意義上的文學，文學的範圍縮小。然而同時，由於印刷術的改進，圖書出版業的發展，文盲的逐漸減少，從前作為一小批文人貴族所壟斷的特權的文學變成了人數眾多的知識分子的文化職業。文學成為提高廣大民衆智力水準的手段。正是在這樣大的社會背景下，將作家當作職業的人來研究，將文學作品當作傳播方式來研究，將讀者當作文化商品的消費者來研究——這種在人們傳統的眼中頗有瀆聖之嫌的研究方法，不僅有了可能，而且成為一種必需的工作。繼斯達爾夫人之後，特別是自法國哲學家孔德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創立實證社會學以來，文藝社會學的研究領域逐漸拓展深入。在不斷完善著文藝社會學研究方法的同时，也相當準確地映現出了西方社會中形形色色的文學面目與文學流派。

中國歷史似乎恰巧比西方晚了一個世紀。當一八〇〇年斯達爾夫人敏銳地察覺到社會環境對作家發生著從未有過的直接快速的影響時，當時中國的文人還沈浸在繁瑣考證、經世致用的迷夢之中。關於十八世紀，或者十七世紀、十六世紀，乃至更早時間的文學狀況，儘管各個不同時期的社會環境也仍然相當明顯地在文學中打下了各自的印記，然而，它們卻都缺乏像近代出版業的發展、教育的普及這樣一些因素對文學發展所帶來的根本性質的變動。它們都仍然屬於封建農業文明的產物，並不帶有工業革命的性質。只有在在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之後，中國社會原有的緩慢發展過程才被

迫推進世界歷史發展的軌道，中國歷史才開始了與幾千年的封建社會截然不同的質的變化。這是一個劃時代的重要變動。在歷史進入到二十世紀前後，這種變動便已從少數覺醒的知識分子與沿海地區，擴展到幾乎全國的所有地方。在政治上，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埋葬了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正式開始了爭民主、爭自由的社會變革；在經濟上，隨著殖民勢力的侵入，近代工業文明沈重打擊了幾千年來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生產方式；在文化上，由於西方文化典籍的翻譯和出國留學制度的實行，歐風美雨如大江大潮衝擊著中國人傳統的心理堤岸；在社會成員的組成上，不僅第一次出現了大量的產業工人，而且也第一次出現了真正具有職業特點的知識分子……這一切，都發生在我國歷史步入二十世紀的關頭，發生在距斯達爾夫人發表《從文學與社會制度的關係論文學》一百年之後的中國。

現代文藝社會學研究方法主要包含有下列三個要素：一是從社會經濟的總體發展上來分析文學的發生與發展。就如法國文藝理論家呂西安·戈德曼指出個人主義文藝建立在自由經濟之上、危機感的小說建立在個人壟斷時代之上、創造力趨向消失的小說建立在國家壟斷時代之上那樣^⑥，著力揭示出社會史對文藝史的具體影響。二是用社會學的具體方法（如統計調查法）來從事文學研究。把文學藝術作品看成是人們的精神產品（在近代社會則更具有「商品」的意味），注重研究這一產品得以產生的物質基礎和生產條件，研究這種產品的創造者——文學藝術家同社會之間的關係；研究傳播媒介（評論家、出版商、書商、圖書館、書展等）對文藝創作的影響；還研究文藝作品的消費，誰消費了什麼？為什麼？在大量實證材料的基礎上，形成客觀而公允的看法。三是擴展文藝社

會學與其他各學科的聯繫。不僅把文藝作品看作是一種社會文化事實，而且也看作是一種審美事實。這是現代文藝社會學趨向成熟的標誌。接受美學、藝術心理學，乃至其他一些著重文本分析的研究方法，都可以被吸攏來加以運用。現代文藝社會學已經不滿足於論證特定作品同特定社會之間的關係，不僅僅對文藝的社會關係作出單向線性的解釋，而是力求更加全面系統地考察文藝的社會關係，注重對整個文藝社會史作出評價。無疑，這給我們的課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時，它也為我們提供了更為堅實的理論保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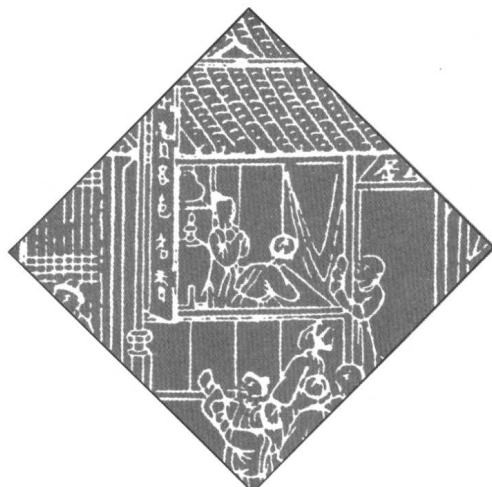
這是一個誘人的課題！這也是一項極需付出艱辛勞動的工作！

讓我們懷著極大的熱情與耐心來進行一次長途的跋涉吧。因為，我們面臨的不僅是一個「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而且我們還將站在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學的起跑點上！

注釋：

- ①《文學評論》一九八五年五期。
- ②上海文藝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 ③《黃河》一九八七年四期。
- ④收入《個性·自我·創造》，浙江文藝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 ⑤羅貝爾·埃斯卡皮：《文學社會學》頁八。法國大學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

⑥ 呂西安·戈德曼：《馬克思主義和人文科學》，法國加利瑪出版社一九七〇年版。



上編
經濟篇

